

十九世纪欧洲史

[意] 贝内德托·克罗齐 著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十九世纪欧洲史

[意] 贝内德托·克罗齐 著

田时纲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九世纪欧洲史/(意)克罗齐著;田时纲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ISBN 978-7-100-09926-4

I. ①十… II. ①克… ②田… III. ①欧洲—近代史—1815~1914 IV. ①K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263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十九世纪欧洲史

[意] 贝内德托·克罗齐 著

田时纲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9926-4

2013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¹/₄

定价:27.00元

Benedetto Croce

STORIA D'EUROPA NEL SECOLO DECIMONONO

根据 Editori Laterza 1981 年版译出

译 序

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年)是20世纪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文学批评家、政治家,更是享誉西方的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

1866年2月25日,克罗齐出生在拉奎拉的贝斯卡塞罗里的名门望族,从祖父那代起家族迁居那不勒斯。早在少年时代,克罗齐就显露出对历史书籍的兴趣。17岁时,突发的地震夺去其双亲和姐姐的生命,他受了重伤;后移居罗马寄养在堂叔、著名自由派政治家斯帕文塔家中。到罗马的最初数月,因失去亲人、病痛折磨、前途未卜,常常夜晚蒙头大睡,清晨不起,甚至萌生自杀的念头。但他很快克服精神危机,到罗马大学法律系注册,他并不专注听课,也不参加考试,而是去图书馆博览群书,研究自己喜欢的题目。

20岁时,克罗齐离开罗马重返那不勒斯并在那里定居,立即开始历史研究。26岁时已完成《1799年的那不勒斯革命》、《那不勒斯的历史与传说》、《巴洛克时代的意大利》等历史学著作。但勇于探索的克罗齐对取得成绩并不满足,他通过对维科《新科学》的研读,眼界开阔、认识深化,对当时学术界盛行的实证主义思潮特别反感,决心粉碎“实证主义坚冰”。27岁时,他在彭塔亚纳学院宣读题为《艺术普遍概念下的历史》的论文,这标志其历史理论研

究的开始。

从此，克罗齐对历史和史学的研究从未中断。他历史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既有本国史（那不勒斯王国史、意大利史），又有外国史（西班牙史、欧洲史）；既有当代史，又有近代史（文艺复兴、巴洛克、19世纪）；既有政治—伦理史，又有史学史、美学史、文学史、戏剧史。他广泛深入研究了历史和史学的许多重大问题，诸如历史的当代性，历史著作的历史性、真实性、统一性，史学同哲学、文学、政治、道德的关系。克罗齐在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的两个领域均做出独特贡献。

正是在法西斯统治时期，随着将哲学思想同政治史、文学史的不断结合，克罗齐极大地丰富了哲学思想；尤其深化了历史理论问题，他逐渐认清它们就是哲学问题。起初克罗齐把历史学作为其精神哲学的终点，继而把自己的哲学称作历史方法论、绝对历史主义。虽然克罗齐是个书斋学者，但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从不退缩。1925年5月1日，由克罗齐撰写的《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在《世界报》上发表。这令墨索里尼大为恼火，先是对克罗齐进行诬蔑，继而游说拉拢，最后派匪徒捣乱并监视、跟踪，把克罗齐排除在学术团体和公众活动之外。但在近20年中克罗齐始终未向墨索里尼低头，他成为意大利知识界反法西斯的精神领袖，他用自己的历史著作及哲学著作同法西斯作战。在法西斯倒台后，他积极参与意大利共和国创建和宪法起草等政治活动。1947年后，克罗齐把主要精力转向学术研究。他先是在那不勒斯创建意大利历史研究所，后辞去自由党主席职务。1950年2月，他右半边身子麻痹。他预感到所剩时日不多，于是

加紧整理未发表的文稿，并决定将他的私人图书馆（意大利藏书最丰富的私人图书馆）捐赠给意大利历史研究所。1952年11月20日，克罗齐与世长辞，享年86岁。

在克罗齐的众多史学著作中，以史学三部曲——《那不勒斯王国史》、《1871—1915年意大利史》和《十九世纪欧洲史》最为著名，而《十九世纪欧洲史》是其代表作。

《十九世纪欧洲史》成书于1931年，题献给他的德国挚友、著名文学家托马斯·曼，卷首献词引用但丁《神曲·地狱篇》第23首歌“此时你的思想进入我的思想，带有同样的行动和同样的面貌，使得我把二者构成同一个决定”。《十九世纪欧洲史》叙述并分析了从1815年（拿破仑滑铁卢战败后）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欧洲（主要是西欧）百年历史。全书共分10章，前3章可视为导言——“自由的宗教”，“对立的宗教信仰”，“浪漫主义”；在后7章，克罗齐把百年历史分成5个历史时期——1815—1830年，1830—1847年，1848—1851年，1851—1870年，1871—1914年。

时隔70多年，今天的读者仍会饶有兴趣地阅读此书，这不仅因为行文流畅、语言生动（克罗齐是继伽利略之后的另一位意大利科学散文大师），更由于某些精辟见解仍能发人深省。诸如：他把浪漫主义区分为理论与思辨的浪漫主义和实践领域的浪漫主义——情感与道德的浪漫主义，前者闪烁真理光芒，后者表现为“世纪病”。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同资产阶级政客相比判若云泥——只要共产主义同私人经济利益作斗争并有利于公共利益，只要它能使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会阶级的任何政治理想活跃，唤

醒它们并用纪律约束它们，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它就仍能证明自己的优越性，从而摒弃它或希望它在世界上不存在都是愚不可及的。他对罗马天主教会反动本质认识入木三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标志作为精神力量的罗马天主教的内在衰落，反宗教改革、尤其是 19 世纪自由主义运动加速这种衰落。即使罗马天主教会肉体得救，灵魂也未得救，它从事的是政治事业而不再是宗教事业。在支持保守和反动政权方面政治天主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平民、尤其对乡村平民它能煽动起暴动。他对自由主义同民主主义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独特分析——它们共同反对教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共同要求个人自由、公民平等、政治平等和人民主权；但在相似性中隐藏着差异性，自由派和民主派对个人、平等、主权、人民的理解完全不同。他对“自由体制国家”间分歧的看法颇具现实性——它们的分歧是次要的，是策略和方式上的，在根本利益上没有原则分歧。他对建立国家联合体的预见颇具前瞻性——由于更宽泛的民族意识的形成，譬如欧洲意识，各个民族国家将建立多民族国家或国家联合体。

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克罗齐对欧洲“自由体制国家”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扩张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因为这是个难以解释的矛盾（以自由标榜的欧洲国家用暴力剥夺非洲和亚洲民族的自由）。但他毕竟承认扩张过程极端残酷，征服者和传教士紧密勾结，征服者惯于用未来福祉进行辩解。而当他称非洲和亚洲被侵略被压迫民族为野蛮或处于低级文明民族时，显现出其阶级局限性。

毋庸讳言，克罗齐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归根结底历史是精神的运动、发展过程。他甚至说过“历史是历史判断”，历史

的主词是文化、自由、进步等概念。

然而,作为历史学家,克罗齐毕竟为后人留下浩瀚的社会史、文化史著作。克罗齐以其深刻的思想、渊博的知识、翔实可靠的史料及清新自然的文体,为西方史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作为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克罗齐对传统史学种种弊端的敏锐洞察,对历史研究中“客观性”、“文献性”、“诗性”、“实用性”、“倾向性”的有力批判,对历史编纂学自身规律及其历史的关注,在西方史学界产生过深远影响。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受到克罗齐的明显影响,他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可视为对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引申。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和科尔顿将 19 世纪浪漫主义思潮划分为文学艺术的浪漫主义和政治的浪漫主义显然受到克罗齐的启发;他们对 19 世纪共产主义的认识与评价也同克罗齐大同小异。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一再引述克罗齐的观点,比如“克罗齐把 1871 年到 1914 年这个时期称作‘自由主义时代’。从这个时期的公众生活以及政治和社会制度充满着自由主义思想这个意义来说,‘自由主义时代’一词是适用的……”。

田时纲

2004 年 11 月于那不勒斯

献给托马斯·曼

此时你的思想进入我的思想，
带有同样的行动和同样的面貌，
使得我把二者构成同一个决定。

——但丁，《神曲·地狱篇》第23首，第28—30行

目 录

第一章	自由的宗教	1
第二章	对立的宗教信仰	14
第三章	浪漫主义	33
第四章	抵抗与反对专制统治及战胜专制统治 (1815—1830年)	46
第五章	自由运动的发展;同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初冲突 (1830—1847年)	83
第六章	自由—民族主义革命、社会—民主主义革命与反动 (1848—1851年)	133
第七章	革命的复兴与欧洲自由民族的普遍调整 (1851—1870年)	168
第八章	德意志强国的统一与欧洲公共精神的变化 (1870年)	198
第九章	自由时代(1871—1914年)	214
第十章	国际政治、行动主义与世界战争 (1871—1914年)	261

跋	282
人名译名对照表	292
克罗齐生平著作年表	301
初版译后记	312
修订版附记	314

第一章 自由的宗教

当拿破仑冒险事业终结、那位天才暴君从其占据的整个舞台消逝后，其战胜者意见一致或竭力相互一致并达成协议，通过复辟旧政权和适时重新调整版图，以给予欧洲一个稳定形势，代替法兰西民族帝国相当持续但动荡不已的状态——在一切民族那里燃起希望之火并响起要求独立与自由的呼声。这种要求越是遭到拒绝和迫害，就变得越强烈和急不可耐；在屡遭绝望和失败后，希望迅速复苏，意志更加坚定。

在德国、意大利、波兰、比利时和希腊，在遥远的拉丁美洲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奋起反抗外国统治者和保护者；或被肢解的民族奋起，靠征服、谈判、王室家族的遗产权利，强行同民族同源、形态相同的国家实现政治统一；或被分裂为许多小国的民族，因如此破碎，同其他统一的大民族相比，感到它们在世界共同生活中应承担的角色被阻碍、被减弱、被取消，它们的尊严受到侮辱。在那些或其他民族那里，需要司法保障，需要凭借新型或革新的代议制参与行政管理和统治，需要公民根据特殊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结成不同的社团，需要借助新闻公开讨论“宪法”（正如当时所说）的观念与利益；在这样的宪法业已获得“文件”形式的民族，比如法兰西那里，需要保障它们并丰富它们；在代议制已长期活动并逐渐形成

的其他民族，比如英吉利那里，需要去除残存障碍和不平等，需要普遍现代化和理性化以使生活方式和进步更灵活更宽泛。

不同民族的历史前提和现实条件及其心灵、习俗千差万别，因此根据不同国家，那些要求在次序、程度、细节和特色上也千差万别。在一国首要要求摆脱外国统治或实现民族统一，在另一国则是用立宪政体代替专制政体；这里，主要是选举权的简单改革和扩展法定政治能力，那里，却主要是首次或在新基础上确立代议制体制；在一国因以前世代的活动，尤其由于革命和帝国的活动，业已拥有世俗平等和宗教宽容，人们为让新社会阶层参政而开始争斗，而在他国适宜初步限于反对封建阶级的具有奴役形式的世俗和政治的特权，摆脱教会压迫。然而，尽管它们的重要性不同，它们显现的先后次序不同，但所有这些要求都紧密相连，一些要求迟早引起其他要求，让在远处初见端倪的其他要求出现；一个词凌驾所有这些要求，它包含全部要求并表达引导精神——词汇“自由”。

诚然，在历史上它不是一个新词，正如在文学和诗歌中，甚至在文学和诗歌的修辞中，它也不是新词一样。希腊和罗马流传下关于无数自由英雄、崇高行为、为“如此珍爱”的自由慷慨献身的悲剧的记录。在几百年间，自由，呼唤基督徒及其教会；自由，呼吁公社反对皇帝和国王，自由还站在封建主和贵族一边反对皇帝和国王，而皇帝和国王反对贵族、陪臣和篡夺君主权利的公社；自由，激励各王国、各省份、各城市利用自己的议会、法律条款和特权反对专制君主制，而后者则清除或妄图清除阻碍和限制自己行动的东西。自由丧失，一直被视为艺术、科学、经济、道德生活上衰落的原因或标志，或是凝视恺撒们治下的罗马或西班牙人和教皇治下的

意大利的原因。就在不久前，“自由”同“平等”和“博爱”一起，用地震般的伟力动摇旧法国的全部建筑和几乎所有旧欧洲建筑，并使它们沦为废墟；自由令人畏惧的印象仍然存在，似乎必须去除那一名称的美好事物光环和新生事物魅力，其实，它从属的三位一体——“理性不变的永恒三角”，正如诗人文琴佐·蒙蒂^①所说——业已声名狼藉并几乎令人憎恶；但自由独自在地平线上重新升起，作为一颗璀璨的星辰令人流连忘返。那一词语从年轻世代的口中说出，带有发现它是至关重要概念、过去与现在的解释者和未来向导的人的激动语调。

那一古老词语所具有的概念新含义，并未脱离当代人的情感和反思，正如从问题中所见，它很快导致关于自由差异性的问题——现代人的自由同古代希腊、罗马人以及同最近的雅各宾党人的自由的差异性；此问题最早由西斯蒙第和贡斯当^②（1819年他在巴黎大学就此问题主持讲座）提出并研究，直至今日一次又一次地被重提。然而，若此问题具有其实在核心，提出古代和现代的对立则不正确，在这种对立中以希腊、罗马和追随希腊—罗马理想的法国大革命为一方，以目前时代为另一方：仿佛现在不是全部历史的汇集及其最后行动，似乎凭借静止对立就能割裂构成唯一进程的联系。结果，上文断言的对立所决定的研究，面临在抽象中迷失的危险，因为它将个人与国家、世俗自由与政治自由、个体自由与其他所有个体自由（个体自由感到在其中受到限制）割裂，诸如此

① 文琴佐·蒙蒂（1754—1828年），意大利诗人。——译者

② 贡斯当（1767—1830年），法国小说家、政治家。——译者

类,不一而足,把政治自由而非世俗自由给予古人,把世俗自由而非政治自由或仅限于次要政治自由给予今人,或这些判断互相抵触,把个人对国家的更大的自由给予古人,而现代民族不具有这样的自由。当人们试图通过司法区分界定自由理想时,则不断重蹈抽象错误的覆辙,司法区分具有实用性并涉及细枝末节和暂时原则,而不涉及包容一切并超越一切的最高理想。

在那一概念从属的历史、即人们所说的思想史或哲学史中探寻其内容时,则人们对其新奇的意识只能是对在思想中并通过思想在生活中出现的其新含义的意识,人类新概念、人类道路观——这是一条前所未有的既宽阔又明晰的大道。人们不是偶然和突然地达到这一概念的,也不是纵身一跳或振臂高飞就进入这条道路的,而是靠全部经验和哲学在其百年工作中解决才实现的,从而天与地、上帝与尘世、理想与现实之间距离缩小,它们之间的争执得以调解,它们不可分割的统一、即同一性得以承认并领会。当说到思想史和哲学史时,我们是指全部历史整体,也包括称作的文明史、政治史、经济史和道德史,它们提供养分并从思想史和哲学史中获取养分。因此不仅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笛卡儿、康德的历史;而且是如下历史:希腊文化反对野蛮,罗马让野蛮人变文明并成为罗马人,基督教赎救,教会同帝国斗争,中世纪意大利的和佛兰芒的公社,尤其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要求个性获得实用和道德双重价值,宗教战争,英国“长期议会”,在英国、荷兰和美洲殖民地宗教教派确立意识自由,在美洲殖民地发布人权宣言,法国大革命赋予自由独特功效,技术发明和随后产业变革,所有其他历史事件和历史创造;这一切竞相构成实在概念和人类概

念,并把事物法则和规律置于事物中,把上帝置于尘世。然而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它又向前迈进,更加果敢并几乎得出结论,因为它批判了理性与历史的冲突,这种冲突在18世纪理性主义和法国大革命中变得十分尖锐,后者用理性的光辉贬低和谴责历史:它借助辩证法批判并净化了冲突,正是辩证法未让无限脱离有限、肯定脱离否定,从而让理性和实在在新历史观中吻合,并重新发现维科格言的丰富内涵,他说柏拉图探寻的理想国只是人类事物进程。现在,人不再脱离历史被考察,或不再视为历史的复仇者,让过去远离自己,仿佛过去是对耻辱的回忆;而是把人视为真正的、不辞辛劳的作者,他在世界历史中沉思,就像在自己生活史中冥想一样。历史不再显现缺乏精神性而任盲目力量摆布,或被外在力量支撑并逐渐矫正,而显现为精神的活动和现实性,由于精神是自由,即自由的活动。自由的全部活动,其唯一和永恒的肯定环节,仅在其一系列形式中实现并赋予其形式意义,仅解释并辩护非自由的否定环节用其压制、压迫、反动和暴政所起作用,它们似乎是“灾难”,其实是“时机”(正如维科所说)。

这就是新时代的思想和哲学,这种哲学到处涌现,到处传播,挂在人人嘴上,被诗章和活动家格言证实,绝不比专业哲学家的公式逊色。它把过去的糟粕拖在身后,有时披上不合时宜的服装,矛盾缠身并不断挣扎,但总在开辟道路并沿着任何其他道路前进。鉴于在对手、落伍者、反动派、教士和耶稣会士那里发现其踪迹;新精神立场受洗(它从未如此期待过)这一事实就不能不带有讽刺意味:在一个对哲学和近代文化最为封闭,中世纪和经院哲学、教会和专制统治均赫赫有名的欧洲国家——西班牙,此时创造出形容